

两会关注

两会声音



“穿针引线”助推公众更广泛参与环保

NGO 搭建平台促民意进两会

◆ 本报记者张黎

今年的两会“姗姗来迟”，可代表委员建言献策的热情依然不减。

全国政协委员、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持续关注环保，今年，他提出4项生态环保相关提案，其中两项跟环境信息公开有关，是对历年提案的深入追踪。

持续地关注，才有最终的推动，在万捷委员等人的持续努力下，企业环境信息公开通过立法逐渐迈入法制化和系统化轨道。

“因为有一批专业的队伍常年开展实践和研究分析，最后形成了专业性和可操作性强的提案”，万捷委员曾在接受采访

时这样表达，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环保组织和公益机构，就是万捷委员所提到“智囊团”中的一个。

“反复地沟通交流，亲身参与调研讨论，万捷委员深入了解污染源信息公开对环境保护、对企业乃至行业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并连续8年通过针对性的提案关注这个关键议题，促进中国环境信息公开在近年取得突破性进展。”马军说。

如今，环保组织参与两会的途径和平台在拓宽，形式和手段日益丰富，携手委员代表，越来越多的民意呼声走进两会。

承载期待，传递声音，公众关注凝结成两会建议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事关生态延续、国家公共卫生安全的大事。”在今年两会上，来自上海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陈晶莹提交了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议案。

补足短板和弱项，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全国政协委员宋青、全国人大代表李宗胜等，也都把目光聚焦在野生动物保护问题上。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更多人意识到，“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攸关社会公共利益和长远发展，这其中，离不开环保组织的奔走疾呼，也离不开代表委员的热切关注和提前介入。

早在1月24日，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吕植教授等学者和专家就联名发出禁食野生动物的呼吁，随后，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迅速行动，他们联合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服务和研究中心、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以及中国环境报社，共同发起一份倡导性的建议书，核心就指向法律层面的“野保法”修法。

10家环保公益机构很快形成一个包含不同视角和各具多样能力的法律研判团队，开始跨机构联合性工作。他们联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和全国人大环资委提交了修法建议，强调以保护为目的，纳入“公共安全”目标中，并扩大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禁止野生动物的食用和贸易。

这期间，阿拉善SEE基金会也提交了一份全面的立法建议书。大家各尽所长，为推动修法贡献力量。

作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章程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蔡学恩近年来一

直与环保组织保持着专业上的合作和研究关系。3月6日，自然之友与阿拉善SEE公益机构，在新浪微博上联合举办了“我为野保法修法添砖加瓦”微访谈，受邀参与访谈的蔡学恩在线上与网友积极互动，回答网友提问。

“一方面蔡学恩代表很关注野保法这件事情，另一方面，他能从微访谈中，了解到公众的建议和想法，其实是一个聆听基层声音的过程。”自然之友法律与政策倡导专员王鑫一这样对记者说。

这场微访谈，最终话题浏览量高达1500万，参与讨论留言的就有2万多人。

同样关注动物，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计划提交一份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虐待动物法》的议案，建议从法律层面面对虐待动物行为进行有效制约与引导，制定虐待动物法。

而在两会前，由志愿者自发在网络上发起征集100万人支持出台《虐待动物法》的联署活动，在短短3天之内，征得超100万人次的网上签名支持。

对于这项与生物伦理密切相关的倡议与征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生物与科学伦理工作委员会在前期给予了大力支持。

“来自全国的反虐待动物立法志愿者曾积极参与相关立法呼吁，这一举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在两会上有所体现，由此可见，公众的关注也是代表委员的思考，这些民间的呼声，得到了回应。”中国绿发会秘书长周晋峰对记者说。

态环境议题，并通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将相关建议反映给决策部门而努力。

“代表委员的日常非常忙碌，他们想要对某一个问题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社会组织可以发挥巨大的支持作用。”曾任3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周晋峰，如今身在环保组织机构中，对此感触更深。

代表民意、回应关切的前提是对民意的广泛征集，不同层面的声音通过环保组织汇集在一起，聚合强大的正能量，也搭建了开放的平台。“就是要把群众的呼声，结合专家的指导，再加上实地的走访，整合到一起，凝结多方智慧，这也是社会组织不断学习、更加专业化的过程。”周晋峰说。

在自然之友看来，搭建平台、提升能力，是近年来参与两会工作的一个主要内容。除了把本身日常涉及的政策倡导的一部分内容融入两会建议中，自然之友更多的工作是在做“桥梁和纽带”。

“就具体的环保议题，连接代表委员与开展

相关研究的环保组织，以及热心的公众与志愿者，多方对接，共同研讨，共同推进。”王鑫一表示，这个过程中，自然之友也看到，很多成长中的环保机构，他们调研、监督在一线，但往往停留在具体工作上，“我们希望通过开展培训，设立工作坊，提升他们的能力，鼓励他们往前端走一走，协助他们参与立法或决策工作。”

变化还体现在渠道和参与形式上，跨组织间的合作越来越多，议题的持续性和深度广度都在不断延伸。“一些议题不再仅限于两会期间，其实是持续贯穿全年的，我们与代表委员一起走访调研，调动更广泛的参与。”王鑫一说。

而对于那些没有最终走上两会的议题，“也不能忽视，更不能浪费公众的参与热情。”中国绿发会征集来的公众建议在两会前后陆续整理发表，抑或是通过向相关政府部门提交建议函等方式，不断推进环保建议的落实。

“对于群众关注的、关心的，我们就要去跟进、推动，几年下来，一个最大的感受是，人民群众的参与感、幸福感越来越强了。”周晋峰表示。

推动立法，影响决策，广泛动员公众参与

在实践中，环保社会组织凭借自身的平台，充分联络社会力量，有效参与了政策倡导工作，并最终影响决策。

如自然之友开展了一系列土壤污染防治立法调研、土壤污染类公益诉讼个案梳理和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研讨活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交了立法意见和建议；编制了相关立法调研报告，提交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立法机关及原环境保护部。

最终，正式发布的《土壤污染防治法》采纳了自然之友提出的包括细化污染者担责制度等十余条立法意见。

“这无疑是推动科学立法的典型案例，深化了政府和环保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自然之友的王鑫一对记者表示，环保组织以不同的视角参与，更充分地代表社会公共利益。

社会组织参政议政、参与决策，也让参与其中的人备受鼓舞。“我们的积极性更高了，现在也有两会代表委员主动联系我们，了解环境热点。从政府层面而言，也在更积极地回应社会关注焦点，主动担责，对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采访中，周晋峰如是说。

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看来，环保组织的专业化优势日益凸显，就某一个议题持续关注、层层推进，更能高效精准地解决某一类环境问题。

如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携手万捷委员，8年都聚焦在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呼吁加大环境信息公开的监管力度，“年年都在提，每年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在往前推进。”

如今，信息公开日益透明，公开范围不断扩大，并走向规范化，在此基础上，环保组织通过绿色供应链、绿色金融、公众参与等方式，撬动了一批大型企业与社会组织建立良性沟通。

在当前经济下行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双重压力下，恢复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无疑是今年最重要的任务。因此，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与万捷委员更关注加强环境信息公开，促进疫后经济可持续发展，“通过信息化手段精准决策和有效的管理，有助于市场探索和创新相应的环境治理机制协助治污，更广泛激发公众参与监督排污的范围，倒逼企业治污减排。”

马军表示，环保组织在“穿针引线”，利用自身优势，为各方建立信任架设了桥梁；同时，环保组织也受惠于这些代表委员的提案议案，“今后的路更宽了”。

采访的尾声，几家环保组织也流露出共同的期许，那就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空间还非常广阔，从污染监督，到良性互动，再到正向推动，环境保护还需形成合力。未来，这些环保组织将继续与代表委员一起，推动更广泛的公众参与，共同守护美丽中国的愿景早日实现。

沈国军：推动生态保护，也是企业家的使命

本报讯“身为政协委员、企业家，有持续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向前发展的使命。”全国政协委员、银泰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执行主席沈国军表示。今年，他继续提出“加快自然保护区立法，鼓励公众参与自然保护区治理”的建议。

实际上，这已是沈国军委员自2018年起连续第三年针对公益保护地提交政协提案。2019年，沈国军聚焦生态保护地侵权相关问题。建议提交之后，得到了自然资源部和国家林草局的积极回复。2020年，沈国军继续针对探索公益治理、社区治理和共同治理的社会参与模式积极建言。

由沈国军担任执行主席的桃花源基金会长期专注推动公益保护地在中国的试点和落地。目前已经在四川老河沟、四川乐山八月林等5地建立了公益保护地，并正在浙江省衢州市筹备第六块公益保护地。

不仅如此，他还致力于带动更多企业家参与到自然保护区管理中来，发动银泰公益基金会、桃花源基金会与其他24家公益组织共同成立社会公益保护地联盟。

目前，联盟已经建立和管理了39块公益保护地，其中还包括在蚂蚁森林上由超过1亿网友参与认领的公益保护地。

企业家群体、广大网友群体的广泛参与，这正是沈国军所提倡的“公众参与自然保护区治理”的目标。他建议用“商业的手法”和“平台思维”做公益，用行动来唤醒社会对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的关注。

“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长期投入、长期坚持。我们会持续关注并继续投身其中，不断探索、创新公益组织和社会资本参与自然资源保护的方式和途径。”沈国军表示。

张黎

潘碧灵：着力深化野生动物保护措施

本报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激起社会各界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关注。全国政协常委、民进湖南省委主委、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潘碧灵建议，在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执法监管的同时，更要有效推进野生动物保护的公众参与。

潘碧灵认为，食用野生动物并催生“野味产业”，这其中既有经济利益的助推，也有立法和监管上的问题。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专门决定，严格法律约束。现阶段，深化强化各项措施，确保保护工作落实落地，变得更加关键。

潘碧灵建议，修订完善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推动综合性、体系化立法。”强化生态优先、健康至上理念，增加“维护生物安全、生态安全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立法目的。加大对猎捕、交易、滥食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同时，要完善强化相关部门职责监督并加强执法监管。潘碧灵建议，林业和草原部门承担保护的主体责任，农业和渔业部门承担监督利用的审批监督主体责任，而生态环境部门则负责综合监管。要健全执法管理体制，对猎捕、繁育、交易各环节实行全链条严格管控。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国际合作，严厉打击国际走私行为。

营造全民保护氛围，有效推进公众参与，对于野生动物保护十分重要。潘碧灵建议，要加强生态保护和公共健康安全教育，引导转变思想观念，倡导文明卫生生活方式，培养健康饮食习惯，坚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组织开展“让野生动物远离餐桌”的主题宣传活动，利用好“世界野生动物保护日”开展系列宣传活动，让“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理念深入人心。 文雯

蝙蝠不可怕，认知要科学

◆ 本报记者文雯

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石正丽团队的最新研究表明，病毒与宿主间存在进化军备竞赛，所以为了预防下一个SARS样疾病，还需持续监控蝙蝠。从新冠疫情期间，有人提出对蝙蝠进行“生态灭杀”，到如今的科研结论，都表明科学看待蝙蝠十分重要。

两个误解：携带致命病毒，可直接传染人类

目前世界上的蝙蝠有1400多种，占到了哺乳动物物种总数的1/5。这些小家伙也是世界上唯一能够飞行的哺乳动物。

“老百姓认为很多蝙蝠携带各种致命病毒，这实际是一个误解。”国家动物博物馆研究馆员、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蝙蝠专家组成员张劲硕，曾与武汉病毒所合作，研究SARS病毒来源。他指出，网上传言蝙蝠身上有4000多种病毒其实并不正确。实际上，科学家在蝙蝠身上已发现的病毒只有100多种，而且是在不同种类和类群中发现的。

对蝙蝠存在的另一个误解就是所携带的病毒能直接传染给人类。“尽管这次新冠肺炎的病毒和蝙蝠身上的病毒亲缘很近，但是与蝙蝠身上的原始病毒完全不是一种，或者不是一个类型。”张劲硕解释，“从蝙蝠身上的病毒，到人传人阶段，经过了多次变异，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生活在城市中的蝙蝠会携带新冠病毒，更重要的是蝙蝠不会直接把病毒传染给人。”

“大家对蝙蝠的恐惧，很大原因是因为没有科学、正确的认识。”张劲硕表示，人类身体其实也会携带很多病毒，这与蝙蝠身上携带病毒道理一样。

“归根结底，不能打破界限。”张劲硕告诉记者，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老先生，曾在颐和园的佛香阁牌匾后面发现了5种蝙蝠。这些城市

中的蝙蝠与人类共存已久，如果对人类有影响，伤害早就出现了。现在因为疫情，再去伤害它们，“就是伤天害理。”

正确认识：食物链中承上启下的一环

蝙蝠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主要成员，本身是对人类有益的动物。张劲硕介绍，“很多蝙蝠是夜行动物，与白天活动的鸟类形成互补，控制昆虫数量。因此，在生态系统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时，它们还是植物的授粉者，种子的传播者，在食物链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此外，蝙蝠的科学研究价值也很高。研究蝙蝠的回声定位原理，人们为盲人研制出蝙蝠拐杖。蝙蝠身上有很多细微的毛，对微弱气流的感应能力很强，蝙蝠可以根据气流调整飞翔姿态，人类可以研究其中的原理，对

飞行器进行仿生学改造。

“涉及到病毒、疾病和健康等领域，蝙蝠是很好的模型，为什么携带病毒却没事，它们的免疫系统怎么运作？有些几厘米长的蝙蝠可能拥有十几年甚至三十多年的寿命，它们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张劲硕认为，蝙蝠给人类提供了很多启示，可以通过研究蝙蝠了解更深层次的科学机制和机理。

在很多欧美国家，洞穴探险观看蝙蝠已经形成一种产业，张劲硕认为，与中国很多千篇一律的洞穴旅游开发相比，这种既不破坏洞穴生态环境，又可以创收、科普的旅游形式值得借鉴。

“我们对生物演化上和自然规律要有正确的认识，思想上有认识以后才会有理性的态度，继而以科学的方式方法去对待周围的自然与生命。如果没有了蝙蝠，不仅是人类城市，整个生态系统一定会出大问题。”张劲硕强调。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夏履镇中心小学近年来建设绿色学校，积极开展“人鸟和谐”“保卫母亲河”“绿色低碳我能行”等多项环保活动。图为学生放飞被成功救助的小鸟。 王雯摄